

◀ (上接10版)

法来进行中国史研究的情况?

初山明: 目前日本学界应用古文书学的方法研究中国史的学者,大抵可分秦汉魏晋史与明清史两个领域。明清档案数量极多,所以有些研究明清史的日本学者以古文书学作了许多有意义的研究。至于秦汉魏晋史,用古文书学来进行研究的日本学者并不算多。除了我以外,还有关尾史郎先生。关尾先生研究走马楼吴简的文章,基本上都采用了古文书学的方法,我十分同意他的研究成果。此外像鹭尾佑子先生,她一样使用古文书学的方法来复原走马楼的簿籍。然而大部分研究秦汉魏晋史的日本学者对古文书学并不感兴趣,这不能不说是非常遗憾的事情。(按:可参考黄正建,《中国古文书学的历史与现状》,发表于《史学理论研究》2015年第3期)

苏俊林: 中国现在也开始进行古文书学方面的研究和学科建设。2010年开始,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经常举办古文书学的研究班和学术会议。但中国目前似乎还没有出版古文书学的研究专著,大学里也没有开设古文书学的课程(除了简牍学与敦煌文书,但这与古文书学还是有差异)。可以说目前中国古文书学还是处于基础阶段。(按:可参考黄正建,《“中国古文书学”:超越断代文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报》2012年7月25日)中国古文书学的建设,有哪些需要注意的问题?日本古文书学又有哪些值得借鉴的经验呢?

初山明: 我们来读一下河音能平《歴史科學運動と史料學の課題》:古文书学主张“将一枚一枚的文书作为一个事物/史料来客观考察”,这样的研究需要观察原件。古文书学的出发点正在于此:它不是纸上的学问,而是观察原件的学问;古文书学不是文献学,是文书学。古文书学的内涵与研究方法跟研究传世文献完全不一样。

日本当地保存的古文书非常非常多,有100万枚以上。大约16世纪以前的古文书比较少,非常珍贵。到了17世纪以后,就非常多了。可以说,日本的古文书学,完全是建立在大量古文书的解读基础之上的。

日本古文书学透过原件来整理书法、书式、样式还有书体,这跟古文书学的另一方面——对文书的保管、

修复、刊布等技术有密切的关系。在日本大学里,专门研究日本历史的学生,其必修课是去寺院、有来历的世家,直接观察古文书的原件,学习古文书的解读、保管及修缮等方法。可以说日本古文书学既是历史学的一部分,也是博物馆学的一部分,还是田野科学的一部分。

日本古文书学还有一项很重要的内容,古文书辨伪。其实“古文书学”这个词汇最早是从欧洲传入的,它在欧洲被叫作“diplomacy”,“diploma”是证书,“diplomacy”的原意则是证明文书辨伪的学问。欧洲的证明文书经常会造假,所以辨伪是欧洲古文书学最重要的内容之一。日本古文书学的这一面,尤其适用于中国的岳麓秦简等捐赠简。

据我理解,中国古文书学还没有注意到古文书学的博物馆学面向。因此中国古文书学能否参考日本古文书学的研究方法?日本古文书学的研究方法能否应用于中国古文书学?我个人目前持保留的态度。

刘国庆(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博士生):中国最重要的简牍文书学学者应是李均明先生,他1999年出版了《简牍文书学》,2009年出版《秦汉简牍文书分类辑解》,2011年他与刘国忠、郭文玲等人合写了《当代中国简帛学研究(1949—2009)》,其中也提到简牍文书的分类。但整体来说,二十年来中国简牍文书学研究的主体结构没有太大变化,很多术语与定义仍然没有讲清楚,研究还不是很成熟。我想请教初山老师,究竟是怎么理解“简牍文书学”这个术语的?如果要给它下定义,您将从哪些方面来定义?

初山明: 这是最难的问题。简牍文书的分类不太困难,但文书学本来并不是分类的学问,而是以研究文书的各种功能、机能为主的学问。按照功能来分类简牍可能可行,但是实际操作非常困难。一件文书的功能按照时间的变迁而变化,有时候一件文书是文书,但有时候一件文书会变为簿籍。上世纪90年代以后的日本古文书学,基本放弃了分类的方法。

刘国庆: 那日本学者怎么研究古文书呢?

初山明: 现在日本学者不采用分类的方法来进行研究。尽管如此,一般入门书仍然采用分类的方式进行阐述,因为我们找不到更好的方法写入门书。日本古文书的入门书主要



初山老师在铜官窑工作站考察益阳兔子山汉简 游逸飞摄

以书式、样式分类古文书。阐明文书的实际功能,则是另外的研究课题。我现在参加陶安先生主办的研读班,研读班对里耶秦简做进一步的注释与整理。我们首先从里耶秦简中选择出20—30种书式,然后按照书式来分类里耶秦简,注释基本上按书式排列,这样矛盾比较少。

游逸飞: 初山老师能不能多介绍一些观察古文书原件的例子?

初山明: 为什么我们要研究古文书的原件?我可以举一个例子。我有一个研究日本木简的朋友山中章。他以前专门研究日本出土的“荷札木简”(一种牌子,相当于秦汉简牍的楮)。观察实物时,他注意到不同荷札木简的制作方式可能有差异。一个遗址出土的几百枚荷札木简,可以区分出好几种不同的制作方式。他再将荷札木简的制作方式与荷札木简上的文字对照,发现荷札木简的书手和制作方式存在明确的对应关系。于是他得出结论:日本古代的下级官吏自己造简,自己写字(见山中章,《行政運営と木簡》,收于《日本古代都城の研究》,东京:柏书房,1997年)。这是非常重要的发现,我想研究古文书原件的意义就在于可以揭示这方面的结论。

周海锋(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博士后):初山老师对岳麓秦简抱着什么样的态度?我们知道有些学者是抱有怀疑态度的。

初山明: 不会有怀疑啊!谁可能做出这样的假简?怀疑岳麓秦简真伪的学者,可参考我跟张春龙、大川俊隆合撰的《里耶秦简刻齿简研究——兼论岳麓秦简〈数〉中的未解读简》(《文物》2015年第3期),岳麓简中有关刻齿的记载和里耶刻齿简的原则不谋而合,作伪者当时不可能得知未

刊布的里耶刻齿简资料。毫无疑问,岳麓秦简是非常重要的秦汉史研究资料,对秦汉法制史的研究尤其不可或缺。

游逸飞: 我们可能从古文书学的角度研究岳麓秦简吗?

初山明: 我之前读过萧灿的《岳麓书院藏秦简〈数〉研究》,她就运用了一些古文书学方法,来探讨岳麓秦简《数》的文献性质。她说岳麓秦简《数》是一个抄本,因为内容有很多自相矛盾之处。这正是以古文书学研究岳麓秦简的好例子,岳麓书院的学者其实已经使用古文书学的方法来研究岳麓秦简了。观察原简照片,观察原简背面的划线,这都符合古文书学中观察原件的要求。岳麓秦简的辨伪,古文书学的方法同样适用。从用字、书式、简背划线等角度来判断真伪,都属于古文书学的方法。

游逸飞: 您刚刚指出日本的秦汉史研究者不一定运用日本古文书学的方法。这方面能不能多谈一下?当然我们更想了解日本新一代的秦汉史研究者如何运用日本古文书学的方法,例如比您年轻的高村武幸先生。

初山明: 高村武幸最近对居延汉简、里耶秦简的研究成果很丰硕。除此之外,青木俊介也在我跟佐藤信主编的《文献と遺物の境界:中国出土簡牘史料の生態的研究》(六一书房,2011年)论文集里发表了关于甲渠候官出土汉简的论文:《候官における簿籍の保存と廢棄 A8 遗址文書庫·事物区画出土簡牘の状況を手がかりに》。永田英正先生对青木俊介这篇文章的评价非常高,他表示之前没想过居延汉简的研究可以到达这样的高度。陶安先生最近出版一本关于岳麓秦简的专著《岳麓秦简复原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也是运用古文书学的方法。研读

班成员铃木直美专门研究随葬简帛,她有一个观点:随葬简帛不是一件独立的“文献”,而是整个墓葬的一部分。此观点得到我们研读班的一致认可。她又提出:随葬简帛是墓葬礼仪过程中的产物。我认为这个观点对研究随葬简帛非常有用。事实上,与其说她的研究是古文书学的研究,不如说是考古学的研究。

我想多介绍一些考古学的简帛研究。随葬简帛大抵可分两类:第一类是遣策、告地策。铃木直美撰写了《馬王堆三號墓出土簡にみる遣策作成過程と目的》(收入上引《文献と遺物の境界》),对这批简牍的形状、书式、出土位置加以分析。这篇文章在日本学界的评价非常高,应该翻译到中文学界来。第二类随葬简帛是书籍,《后汉书·周盘传》有条非常有意思的记载:

建光元年,年七十三,岁朝会集诸生,讲论终日,因令其二子曰:“吾日者梦见先师东里先生,与我讲于阴堂之奥。”既而长叹:“岂吾齿之尽乎!若命终之日,桐棺足以周身,外椁足以周棺,敛形悬封,濯衣幅巾。编二尺四寸简,写尧典一篇,并刀笔各一,以置棺前,云不忘圣道。”

说明“书籍”不只是书籍,也是葬礼文书。《周盘传》提到“编简一书写一(向参加葬礼者)宣示一副葬”的流程,我认为大部分墓葬里出土的书籍,也是通过这个流程来副葬的。所以银雀山一号汉墓出土的《守法守令等十三篇》篇目木牍,可能也是用来向参加葬礼的人宣示,不仅仅是目录。随葬简牍是葬礼过程中的产物,应当充分注意其功能在于形成死者与参加葬礼者的认同。我同意这样的看法,这是考古学的思维。

我对秦汉一般人民的生活与人际关系、最底层官吏的日常活动很感兴趣

欧扬(湖南大学简帛文献研究中心科研助理):湖南益阳兔子山出土简牍中有块以“鞠”起始的木牍,根据其内容可命名为《汉平帝元始二年张勋贪污案》文书。您认为这份文书是否可以称为“鞠”文书?其体现的西汉晚期的司法文书制度,与西汉初年有何差异?您如何评价对该材料的内容与意义?

(下转12版)▶